airiti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九期
2015 年 12 月　　頁 11-42

想像與真實：

《新青年》再現的「啟蒙運動」

陳　建　守*

摘　　要

本文檢視《新青年》這份被譽爲是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劃時代刊物，內中如何介紹歐洲「啟蒙運動」此一歷史時段／事件。本文亦梳理「啟蒙運動」一詞由晚清以迄民國的翻譯簡史。本文發現《新青年》中尚未出現「啟蒙運動」對譯 “Enlightenment” 的詞彙，而是延續晚清以來的詞彙「革新文學」的慣習用法，以「革新時代」和「革新運動」等詞彙進行敘述。

關鍵詞：新青年、啟蒙運動、革新時代、革新運動、革新文學、概念史

* 作者現爲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airiti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the Discours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Journal *New Youth*

Chen Chien-s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e usage of "Enlightenment 啟蒙運動 " in the journal "*New Youth* 新青年 ." This articl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lexical translations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Secon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authors in "*New Youth* 新青年 " did not use the translation of "Qi Meng Yun Dong 啟蒙運動 ." They followed up the term "Ge Xin Wen Xue 革新文學 " from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ransformed this term into "Ge Xin Shi Dai 革新時代 " and "Ge Xin Yun Dong 革新運動 ." Third, this article could not find any translation of "Qi Meng Yun Dong 啟蒙運動 " in this so-called "enlightened journal."

Keywords: *New Youth*, Enlightenment, conceptual history

airiti

想像與真實

《新青年》再現的「啟蒙運動」*

陳　建　守

一、前言

1915 年夏天，陳獨秀（1879-1942）取道日本返回上海，面對當時中國國內二次革命失敗的背景，由此心生政治革命不如文字革命力道強勁的念頭。[1]陳獨秀開始尋思以刊物改造中國人心靈的想法，便找來一眾同道友朋籌辦《青年雜誌》（法文刊名 "*La Jeunesse*"）。1915 年 9 月 15 日，由陳獨秀領銜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青年雜誌》即《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爲了避免與上海基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糾謬攻錯，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特申謝悃。本文研究中關於「啟蒙」、「啟蒙運動」的詞彙資料，部分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鄭文惠主編）持續開發功能與完善數據庫並提供檢索服務，謹致謝忱。

1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一文中再覆斯旨，「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見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 年 2 月 1 日，頁 4。本文所用的《新青年》版本是：新青年社編輯部編：《新青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求益書社，1935 年重印本）。書前有蔡元培和胡適的序言，本文所引用的《新青年》全係這個版本，下文不再重複徵引。

airiti

督教青年會主辦的《上海青年》名稱混淆，自第2卷（1916年9月1日）起更名爲《新青年》。若是以《青年雜誌》創刊的時間計算，今年（2015）適好是創刊一世紀的年頭。從字面的意義來看，《新青年》代表的是對其父輩的反抗，以及對自我界定的探求。「青年」一詞可以作爲對崇尚創新的反抗者的普遍代稱，身爲新的文化創造者的「青年」，不斷地透過一種集體的反抗來界定自己。與其說「青年」反抗的是他們的父輩，倒不如說是反抗他們所繼承而來的父權文化權威。[2]《新青年》非但要以「青年」的反抗姿態，在言論場域上喉舌不已；抑有進者，還要以「新」爲名，要當一位徹頭徹尾煥然一新的「新青年」。就如同陳獨秀以〈一九一六年〉爲文，認爲「二十世紀之第十六年之人又當萬事一新，不可因襲二十世紀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爲滿足。」[3]這樣對「新」的崇拜與追求，在《新青年》中非常強烈。陳獨秀繼而道出：「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間在歷史上畫一鴻溝之界。自開闢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必自殺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4]這樣的反省力道，已經不再僅止於反叛傳統的父權文化，而是要反叛自身，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藉以達致全新的自我。

熟悉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讀者可以發現，《新青年》常被譽爲是近代中國思想運動的劃時代刊物，[5]亦或是被描繪爲扮演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傳遞自由主義思想重要角色的雜誌。[6]然而，我們需要注意

---

2 Carl E. Schorske 著，李鋒譯：《世紀末的維也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10。

3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1916年1月15日，頁1。

4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頁2。

5 譬如胡適在《新青年》重印本序言所云：「《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書前無頁碼）

6 高力克：〈《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

airiti

的是，這裡所使用的「啟蒙運動」一語是由歷史發展的後見之明進行觀察的表述。作爲歷史分期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指稱的是介於文藝復興（Renaissance）和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中的歷史時段；作爲思想文化活動的「啟蒙運動」則是主要指陳以西歐國家知識人爲首所組成的「文人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在十七、十八世紀所喉舌的理念、言說和思想活動。[7]無論如何，「啟蒙運動」一詞的概念全然是一項舶來品，並非近代中國知識人的創獲發明。我們現今習以「啟蒙運動」對比中國本土的各色思想和事物，這是一種以西況中的比附狀態，挪用西方的概念或歷史事件回頭檢視近代中國自身的情況，未必就是被比附者的歷史實情。職是之故，本文試圖逐一檢視《青年雜誌》和《新青年》所收錄的文稿內容，內中對於歐洲的「啟蒙運動」是否有所介紹。本文的作法不在於檢視《新青年》中有多少論述符應歐洲啟蒙運動的相關理念，而是嘗試梳理《新青年》如何介紹歐洲的「啟蒙運動」此一歷史事件。

---

42 期（1997 年 8 月），頁 39-46。該文提出「自由主義是歐洲啟蒙時代的主流思潮。『五四』模擬西方啟蒙的新文化運動，亦有一個西方自由思想的接受過程。……《新青年》自由思潮的演變，集中表顯了『五四』啟蒙思潮變遷的趨向與脈理。」高力克：〈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陳獨秀與杜亞泉〉，《（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 113 期（2009 年 6 月），頁 18-28。該文認爲「中國的啟蒙運動始於清末民初轉型時代，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而達於高潮。」又或者是如同一本展覽圖錄所云：「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吹響了思想啟蒙的號角，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幕。」見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編：《新時代的先聲：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圖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年）。

7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史丹佛大學便以「文人共和國」爲名，集結世界各地的學者共同商討這段歷史，並且創辦「描繪文人共和國」（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網站，見：http://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index.html 。

airiti

二、「啟蒙」＋「運動」＝啟蒙運動

傳統漢語典籍中，早已出現「啟蒙」一語，若是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製作的《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進行檢索，則可發現在陳壽的《三國志》，卷3中有云：「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這裡的啟蒙所指陳的是顧愷之的《啟蒙注》，此處係裴松之的注文，而非原書卷3《魏書・明帝紀》的本文。而在《隋書》，卷32則有：「《啟蒙記》三卷，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同樣指陳顧愷之的作品。這裡的啟蒙尚不具我們一般熟習的「啟發蒙昧」之動詞意涵，而是作爲書名而出現的。在傳統的漢語典籍內，啟蒙多作爲書籍的接首語。較早使用「啟蒙」作爲動詞的例子，出現在明人李燁然刪定，徐文龍、陳懋德訂，宋奎光輯的地理書《徑山志》中：「說法談經，啟蒙祛蔽」。若是以近代中國發行最長的報刊《申報》而論，「啟蒙」一詞早在1872年現身，惟仍是作爲書名出現：「則有曰《算學啟蒙》、《勾股六術》、《運規約指》三書」。[8]作爲動詞使用的啟蒙則在稍晚出現，在一篇討論傳教士如何精挑細選徒眾，以防宵小雜入「洋教」的文章中，提及「貴教智明之士，往而教之，正如啟蒙發瞶」。[9]

由此觀之，「啟蒙」一語在近代中國的問世，仍是延續傳統漢語典籍中的形式出現，厥屬傳統詞彙的範疇。因此，「啟蒙」一詞，對近代中國的思想界來說並不陌生。[10]中國自古有「蒙學」、「蒙館」之說，內涵之義即是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11]1856年，英國傳教士理

---

8 〈擬製造局新刻西學書十三種總序〉，《申報》第80號，同治壬申六月廿七日（1872年8月1日），第1版。

9 〈擬請西國傳教牧師愼擇端人說〉，《申報》第653號，同治甲戌五月初三日（1874年6月16日），第1版。

10 關於「界」的用法，參考章清：〈「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7号（吹田：関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拠点ICIS，2011年3月），頁55-76。

11 例如《啟蒙字書》、《啟蒙算學除法》、《啟蒙算學》一類的書籍。

airiti

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出版《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2] 一書，該書是作爲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的理雅各，給中國學生學習英文所編的英漢對譯教材。在書中提及，野蠻民族、半開化民族和文明民族的區別時，則提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羅斯、波蘭、英國和美國人「其中士子諳熟技藝文學，惟民尚多愚蒙」。在這當中，又以英美兩國「其民爲天之至明達者」。「明達」一詞指的是「開化」（enlightened），即前此所使用的「啟蒙」狀態之意。[13]「啟蒙」一詞亦有翻譯作「啟明」者，如《新青年》上有署名「凌霜」者，介紹19世紀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之地位，即云：「及托爾斯泰起，俄羅斯昔爲世界所譏爲 Dumb Russia 無文學之國者，一躍而爲文學復興時代之啟明，俄羅斯之魂寄於托氏一身。」[14] 又或者是茅盾（1896-1981）介紹十九世紀匈牙利文學的發展階段，「十九世紀的匈牙利文學，這一百年間的匈牙利文學是一步進一步的發展，若照年代先後分起期來，可分爲三期：一啟明期，二隆盛期，三極盛期。」[15] 這裡所使用的啟明期，其實就是啟蒙期的代稱。然而，“Enlightenment” 一詞何時在漢語世界中被等同於「啟蒙運動」，其確切時間點猶難查考。“Enlightenment” 一詞作爲「啟蒙運動」的翻譯史較爲模糊；就現階段筆者寓目所及的材料而論，只能進行大略的推測。「啟蒙運動」在漢語世界中的理解涉及到傳統漢語「啟蒙」一詞的理解，以及從日語借貸用來翻譯歐洲的現代詞語「運動」[16] 一

---

[12] 關於這部書還可參見沈國威與內田慶市的討論。見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啟蒙塾課初步」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 年）。

[13] 黃興濤：〈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頁 8。

[14] 署名「凌霜」：〈托爾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新青年》第 3 卷第 4 號，1917 年 6 月 1 日，頁 1。

[15] 沈雁冰：〈十九世紀及其後的匈牙利文學〉，《新青年》第 9 卷第 2 號，1921 年 6 月 1 日，頁 4。

[16]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頁 410。

airiti

詞的組成。要之，「啟蒙運動」的翻譯可拆解成「啟蒙」加上「運動」的理解方式。

「運動」一詞在晚清思想知識界中兼有三義，一義是謂身體上的活動、體育活動之代稱，如《童子世界》上有上海幼童爲應付考試之作，提及如何大量開設運動會以爲訓練身體之憑藉，進而成爲保家衛國之基礎。「開運動會者乃從軍眾人之謂，而非保一身之謂也。今歐洲各國與亞洲之日本侮我至此，併我國之土地，奪我國之產業，當何以敵之？此無他法，惟廣開運動會而已。」[17] 第二義乃是觀察者見某物體相對於他的位置發生變化，即稱該物在運動，如機器運動或天體運動之說。例如收錄晚清西學書目資料庫的《增版東西學書錄》有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翻譯，徐壽述（1818-1884）的《機動圖說》一書，該書的解說：「裒採群書而成，凡機器運動之法畢具，閱之足以自出新裁」即爲例證。[18] 最後一義則爲在社會群眾間，有意義的宣傳活動，亦或是指稱集體／群體的行動，較爲接近今日習知的社會行動（social movement）之意。如《游學譯編》取材日本報紙論述天津日商如何設立日清銀行作爲擴張商權之「運動」。[19] 該文其後又被在浙江創刊的《萃新報》轉載，[20]《萃新報》轉載該文應當是看重內容的有效性，不過，這也正顯示了「運動」一詞在言論市場上的方興未艾，其傳播的可能空間，實無遠弗屆。又或者是如在東京創刊的《江蘇》上，有文章提及俄人以東三省撤兵問題，趁隙作亂，

[17] 劉寶書：〈廣開運動會說〉，《童子世界》第31期，1903年，頁43。本文用的版本是「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的全文掃瞄版。

[18] 《增版東西學書錄》，收入「晚清西學書目資料庫」，本文用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的全文檢索版，頁157。

[19] 〈日清銀行設立之運動（譯日本報）〉，《游學譯編》第12期，1903年，頁1-4。本文用的版本是「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的全文掃瞄版。

[20] 〈日清銀行之運動〉，《萃新報》第4期，1904年，頁1a-3a 。該文作者處有「游學譯編譯日本報」字樣。本文用的版本是「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的全文掃瞄版。

airiti

逼迫中國簽訂新約，中國全國之國民應該憤起「運動」，以民氣爲本作爲抗議之資。[21] 在晚清所出版的小說中，對「運動」一詞亦有所使用，如〈新黨現形記〉中有此描述：「看到後來，率性將一切名心、利心、自私自保、貪鄙卑陋，和盤托出，分明是恣橫，誤認爲自由；分明是虛驕，誤認爲高尚；分明是欺詐，誤認爲權術；分明是哄騙，誤認爲運動；分明是嫉妒，誤認爲競爭；分明是專制，誤認爲決斷；分明是懶惰，誤認爲從容；分明是怙過，誤認爲堅定；分明是曖昧，誤認爲秘密；分明是暴動，誤認爲進取；分明是怯懦，誤認爲忍耐；分明是鹵莽，誤認爲勇往直前。」[22] 從上文的討論來看，「運動」一詞先由晚清著重身體（physical）的體育活動論述而起。例如有大學在1896年報導校內運動賽事之消息，又或者是《東方雜誌》在1905年爲文論述運動的目的與效果，皆是著眼於「運動」的身體層面。[23] 而Denise Gimpel則指出晚清民國時期的女子體育活動，針對女性身體的論述是一脈相承。性別因素從晚清開始建構現代中國的體育論述，論述的角度已然跳脫國族視野，進而提倡透過體育構築個人身體的自主性。晚清與五四婦女利用體育企求所謂「心靈解放」，藉此跳脫父權體制的桎梏，傳達尋求身體自主的想法。女性對體育的討論，則聚焦在人格發展與體育兩者之間的關聯，主要著眼於女性對身體的自主與掌控，以及如何衝破男性網羅尋求解放。因此，無論是後來由女性提倡的體育救國，抑或其他保國保種的運動，愛國心並非促使女性行動的推進力，對現實生活的考量和自身的掌控，成爲自己身體的主人

[21] 〈對於俄約之國民運動〉，《江蘇》第2期，1903年，頁135-136。本文用的版本是「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的全文掃瞄版。

[22] 見嗟予：〈新黨現形記〉，《新新小說》第2號，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1904年11月26日），收於新新小說編：《新新小說》（上海：上海書店，1980年），頁3-4。

[23] 〈本校田徑賽運動消息一束〉，《交大月刊》第1卷第2期，1896年。〈運動之目的與效果〉，《東方雜誌》第2卷第1期，1905年。本文用的版本是「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1840-1949）」的全文掃瞄版。

airiti

才是最大公約數。[24] 從中可以隱然見到一條「運動」由著重身體的論述，開始往措意「社會」（social）面向的「運動」之轉變。根據瓦格納（Rudolf G. Wagner）的研究，「運動」（movement）一詞作爲一種社會行動形式的概念之全球化，則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主流趨勢。[25]

本文所討論的「啟蒙運動」，在意義上較爲接近社會運動。無論是啟發民智、啟迪蒙昧的思想運動，亦或是在民眾之間進行的宣傳運動，甚至是脫離舒筋活骨意涵的街頭抗議運動，都屬於最後一義的範疇。綜合上述例證，可以揣想的是「運動」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問世（或是可能更早），且在諸多報刊媒體中披露，循環流通，漸次爲眾所知。正如劉禾所言，「運動」一語是來自東瀛的日語借貸詞。從整體脈絡上所言，有直接經由日本報刊譯介取材者；有留學生在日本創立的報刊中披露者，「運動」一詞實與日本脫離不了關係，乃是來自日本的名詞無誤。

三、《新青年》中的「啟蒙運動」

北京新華社在今年9月14日，有這麼一則報導：

> 9月15日是新文化運動重要文化陣地《新青年》雜誌創刊100週年。爲了紀念這個日子，北京市有關部門14日舉辦儀式宣佈陳獨秀故居完成騰退修繕，《新青年》編輯部也將舊址復原。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後

---

24 Denise Gimpel, “Exercising women’s rights: debates on physical cultur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Kai-Wing Chow, et al.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8), 98, 103-106, 113-115, 119.

25 Rudolf G.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66-122.

airiti

> 改名《新青年》）出版，標誌著以科學、民主爲旗幟的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興起。[26]

從這段新聞中，我們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乃是以所謂思想啟蒙運動的姿態出現在記者的筆端，而《新青年》正是發起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的大本營。在《青年雜誌》創刊號，有陳獨秀翻譯薛紐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的專書篇章，其中有一章名曰「十八世紀歐羅巴之革新運動」，內中提及「法蘭西之哲學者」，如此道出：「法蘭西之哲學者分二時代：第一時代在十八世紀前半期，以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爲代表。第二時代在同世紀之後半期，以盧梭、狄對兒及百科辭典家爲代表。」[27]而這群「法蘭西之哲學者」以筆代劍，呼籲改革，「以明晰靈活之筆，發表其理論於諷刺文、於小說、於記事，使不學之俗人亦得讀而解之，其書遂廣行於社會」。[28] 這群哲學者喉舌新價值、攻擊舊制度，「此等哲學已灌輸於歐羅巴全土」，[29] 流風餘韻所及則造成法國大革命的出現。這段論述的重點有二：第一，陳獨秀將十八世紀歐洲啟蒙哲士所構成的思想活動，以「革新運動」譯語一言以蔽之。第二，這群「法蘭西之哲學者」的言論與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有間接的關係。陳獨秀對於這段歷史的總結評價則爲：

> 「萬般事物未有能維持現狀者也」。光明之世，來日可俟理性之光照耀。人類社會基礎應建設於理性之上，夫十八世紀之理性，非科學及事實之觀察嘗試而已、論理而已，哲學者於其所欲改革之社會不甚措意，於現實之人間，非其所知，於農民於

---

26 章利新、熊琳：〈北京修繕陳獨秀舊居紀念《新青年》創刊百年〉，《國際日報》，2015 年 9 月 15 日。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1040975。

27 陳獨秀譯：〈法國薛紐伯著《現代文明史》〉，《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9 月 15 日，頁 9。

28 陳獨秀譯：〈法國薛紐伯著《現代文明史》〉，《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頁 13。

29 陳獨秀譯：〈法國薛紐伯著《現代文明史》〉，《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頁 13。

airiti

> 勞動者，亦無所見解。彼等無宗教、無社會習慣，騁其幻想以造成想像之人物，此人物於幸福之外，無希冀於抽象之理性，外無行爲。人類同性，無不合理，無不善良。欲返其本性，不可不打破諸障碍制度，政府一令足以行之，社會改革固應如是，此皆彼等所放言者也。[30]

陳獨秀的評論已經觸及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以理性掛帥的時代，而且理性之光所照耀的光明之世，便是「萬般事物未有能維持現狀者」的景況。這已經觸及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關懷與字面意義。陳獨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則使用「革新」一語較爲寬鬆的描述方式，「歐洲文藝思潮之變遷由『古典主義』（Classicalism）一變而爲『理想主義』（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文學者反對模擬希臘羅馬古典文體，所取材者中世之傳奇，以抒其理想耳。此蓋影響於十八世紀政治社會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31] 程振基（1891-1940）在另一篇討論英國勞動組合的文章中，在祖述勞動組合的起源時，使用「革新時代」去描述十八世紀的歐洲。[32] 茅盾在一篇介紹十九世紀匈牙利文學的文章中，則是以「唯理主義」來形容十八世紀的思潮：

> 十八世紀初，法國唯理主義（Rationalism）發生，文藝界又受了極大的影響，在匈牙利有詩人皮生俞（George Bessenyai，1747-1811）首先領受了這新思潮，他極傾慕福祿特爾之爲人，也效福祿特爾欲借戲台做宣傳思想的地方，……又做福祿

---

30 陳獨秀譯：〈法國薛紐伯著《現代文明史》〉，《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頁14。

31 陳獨秀：〈現代歐洲文藝史譚〉，《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15日，頁1。

32 原文爲：「英國勞動史上，有一極有趣味的問題，就是英國勞動組合始自何時？……李普生（Lipson）遵從衛蒲（Webb）說，謂勞動組合始於十八世紀革新時代。」見程振基：〈英國勞動組合及其最近趨勢〉，《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頁1。

airiti

> 特爾的散文做小說。……這樣就做成了匈牙利的新古典派。[33]

在《新青年》九卷的全部內容中，涉及到歐洲啟蒙運動的相關描述，便是上文所舉出的四例。這四項例子都尚未出現今日通行的譯法：「啟蒙運動」，所採用的是「革新時代」和「革新運動」這兩項用法，惟在行文上已經多少觸及歐洲啟蒙運動的關懷。

《新青年》中另外一個可資觀察的面向是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譬如一篇譯稿所提及的情況：

> 人常常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者，對於法國大革命沒有什麼貢獻，即使 Rousseau 不曾著作，民主主義也早晚總要出現，不安不滿足的精神久已充滿國內。……但我想或者不如這樣說倒較爲的確，法國哲學者將新思想散布在預備好的熟地上，播了革命的種子。[34]

在《新青年》的同人中，當時已經明確將啟蒙哲士的思想和法國大革命的出現綰連在一起，高一涵爲此申述最多。高一涵（1884-1968）在〈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一文中，如此描述：「故福祿特爾、盧梭之學說，非經法國大革命之鍛鍊，必不能驟見諸施行。」[35]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則是：「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爲近世憲政之精神，盧梭之平等自由論遂喚起法國之革命。」[36] 在〈非君師主義〉一文中，啟蒙哲士的學說，所造就的影響是共和思想深入一般人心，帝制法蘭西由此覆滅。[37] 除了高一涵的論述之外，易白沙（1886-1921）則

---

[33] 沈雁冰：〈十九世紀及其後的匈牙利文學〉，《新青年》第9卷第2號，頁4。

[34] 〔英〕Angelo S. Rapport 著，起明譯：〈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上）〉，《新青年》第6卷第4號，1919年4月15日，頁365。

[35] 高一涵：〈讀梁任公革命相續之原理論〉，《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1915年12月15日，頁3。

[36]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青年雜誌》第1卷第3號，1915年11月15日，頁7。

[37] 原文是：「法國當未革命之前，就有盧梭、福祿特爾、孟德斯鳩諸人各以

airiti

是將盧梭和孟德斯鳩的言論，作爲革命的緣由：「孟德斯鳩述萬法精理，詆賣奴之制，主張人道；盧騷倡人權，申民約，爲文明革命之祖。」[38]

從上文針對《新青年》全部內容的介紹來看，被視爲是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新青年》，對於歐洲啟蒙運動這位先行者實則著墨不多，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啟蒙的啟蒙運動」。現今「啟蒙運動」作爲 “Enlightenment” 的通行譯法，尚未出現在《新青年》同人的筆下。不過，歐洲啟蒙運動的相關概念與關懷已然進入《新青年》同人的眼簾。簡而言之，從《新青年》發表的文章來看，對於歐洲啟蒙運動的陳述，大抵不出兩個向度：其一是專事介紹法國啟蒙哲士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的學說，將其動人心魄的文字魔力，與「革新」當時的社會與民智勾連起來；另一則是鋪陳啟蒙哲士的文字，如何「以筆代劍」，引發法國大革命的產生。

四、思想資源何所自：晚清的「啟蒙運動」論述

自 1915 年 9 月 15 日出版創刊號的《新青年》以迄 1922 年 7 月終刊，共出版 9 卷 54 號的篇幅。大凡一種學術期刊的內容走向，與外在的思潮絕對脫離不了干係。《新青年》這樣以宣傳新知爲主軸的刊物，對於譯語的挑選勢必會受到先前或當下相關論述的影響。本節則試圖梳理 “Enlightenment” 在《新青年》出刊以前的翻譯史，並加以檢視《新青年》的內容與此有何關聯。上文提及《新青年》以「革新」爲字首形容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實是來自晚清一代的使用

天賦人權平等自由之說，灌入人民腦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於一般人心。」見高一涵：〈非君師主義〉，《新青年》第 5 卷第 6 號，1918 年 12 月 15 日，頁 551。

38 易白沙：〈我〉，《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5 號，頁 5。

airiti

方式。由李翥儀、梁柏年泛覽當時所出版關於東西洋史的著作，所編寫而成的《西洋史》，即是一例。[39] 在該書第9章「近世歐洲文明之趨勢」中，將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學術風潮，名之爲「十八世紀文學之革新」，[40] 內中有云：

> 十九世紀革命之風潮，起於十八世紀諸家之學，此學說之興也，各種社會現象其原動力。社會上每搆一奇現象，學問上即闢一新理想，而文學改革時代，此其原因。……此學說之代表人爲法人福祿特爾（Voltaire）哲學者王之友也，王者國之父也。此點即王權所發生，……自王權確定後，百年專制階級制度剗焉立平，乃暴君憑勢而張其燄，用強悍手段以鋤抑平民，變爲專橫政體時代，於是君主爲眾矢所集。自由平等之論，遂洋溢全歐，此文學革新之第二期，此派鉅子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之《萬法精理》，盧梭（Rousseau）之《民約論》，立說最爲著明。[41]

而在最近世史編中，作者開篇即分疏法國大革命產生的原因，在遠因部分，作者提及「革新文學之影響：十八世紀之後半法國文豪皆主張個人之自由，萬類之平等。如孟德斯鳩則有《萬法精理》，盧梭則有《民約論》，唱極端之民主主義，掊擊專制，鼓舞人心，而人民對於君主尊崇之觀念，自然滅殺，此實革命直接之導火線，亦即間接之一誘因也」。[42] 而由黃巖邱古雲記述的《外國歷史講義》中，該講義是作

---

[39] 作者在例言中提及該書是根據「日本文學士野村浩一先生口授，記以漢文。更取德人布列氏所著世界通史，美人軒利氏所著歐洲十九世紀史，日人文學士阪本健一之世界史，博士瀨川秀雄之西洋通史，浮田和民之西洋史，齋藤阿具之西力東侵史，久保天隨之東洋通史，詳參互校，總期不失講師眞義。」見李翥儀、梁柏年：《西洋史》（湖北：法政編輯社，光緒31年〔1905〕），頁1。

[40] 李翥儀、梁柏年：《西洋史》，頁88。

[41] 李翥儀、梁柏年：《西洋史》，頁89。

[42] 李翥儀、梁柏年：《西洋史》，頁93。

airiti

爲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材。該講義開篇是從西洋近世史講起，作者所劃分的西洋近世史是從法國大革命以迄日俄戰爭（1792-1905），這段歷史在作者筆下又可稱爲「泰西十九稘史」，該書對於一眾啟蒙思想家，亦有如下的描述：「孟德斯鳩著《法意》曰三權鼎立也。路索（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著《民約論》曰民意立君也。福祿特爾（Voltaire，1694-1778）更揚其波，以淺近文言發揮奧義，冷刺社會之現狀，使人不堪回首。僉曰是固有行之者，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由今論之，法人之所師者有二：一曰事實，一曰理想是也。西哲有言曰：時勢造英雄，又曰：英雄造時勢，吾於是滋信。故論法蘭西革命而以合眾國獨立十八稘之國情二章，冠於篇首焉。」[43] 至於對孟德斯鳩、路索和福祿特爾的思想影響，作者仍是以「革新文學」一言以蔽之。如此形容：「於是有特倡理論，提起三寸毛錐指中古遺傳之文物制度爲舊弊，欲革故圖新者群起焉然。不在其位故多以文章鳴。其最知名者爲孟德斯鳩、路索、福祿特爾。」[44] 作者繼而花費篇幅詳加介紹法國啟蒙哲士三傑的生平梗概：

> 孟德斯鳩，貴族子也。幼勤學，長爲律師，其後有所感，去之游歷歐洲，觀察世變。一七三四年始著《羅馬盛衰攷》，又著《法意》，蓋經營十四年云。福祿特爾曰：人民之忘其我職也久矣。今孟氏言之，孟氏其至矣。孟氏性溫厚無忤，意純之儒也。路索，瑞士日內瓦人也，幼孤，流落不偶。一七四一年居巴黎，是時巴黎大學懸賞徵文，題曰：學問及數理之進步是否爲腐敗道德之原因之一。路索應之，得賞。一七六二年著《民約論》，此其傑作也。路氏，美風姿也，不修邊幅，人多昵之。福祿特爾，法國文學史上名人也。幼穎悟，不類常兒，雖

---

43 邱古雲述：《外國歷史講義》（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出版年不詳），頁2a-2b 。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於1912 年改名爲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辛亥革命後改名爲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由此觀之，這份文本推估仍是晚清作品。

44 邱古雲述：《外國歷史講義》，頁7a-7b 。

airiti

> 生於閥閱，自視蔑如也。路易十四疾病，民有謗者，福氏與焉，以罪下獄。獄中多爲詩，其辭悽婉動人，遇赦家居，遂以詩歌名，善著小說，多自編爲腳本，袍笏登場，可歌可泣者。普魯士大王弗勒特烈招之居伯林三年，一七五五年完居於日內瓦，以著作終其身。[45]

作者在接下來的篇章中，將西洋近世史進行分期的敘述，第一期是從法蘭西革命以迄維也納會議，對於法蘭西革命的原因，作者與前文《西洋史》同樣提及「革新文學」的影響：「革新文學者提倡舊物破壞論，煽動改革，人心始稍不戢矣。其時更有足以使法人心醉者，則美利堅獨立是也。法人信人生同具此五官心意，美人能之，吾法人詎有不能者乎？一夫振臂跛者思起矣，此其原因也。」[46]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晚清雖然已經開始出現由知識人編寫世界史著作的情況，這段時期的世界史編纂，大多是以改編當時東西洋史的著作爲主，標舉由中國本土知識人所寫的世界史著作，多爲間接改寫或翻譯傳教士或日本學者的作品，完全自著者尚屬鳳毛麟角。若是進一步檢視當時的漢譯日書，亦可增加本文的談資。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在晚清思想界影響頗深，一眾騷人墨士紛紛奉爲圭臬經典、必讀書目，流風餘韻所及，牽動不少晚清知識人的神經，相關概念還透過新學鉅子王韜之手，譜寫進法蘭西史的篇章當中。該書卷10的〈法蘭西記〉便載有相關論述：

> 一千六十三年，與英人爭如拿太，不克，遂棄之講和，藩屬各土皆叛，兵威遂不振。自是政綱陵替，而人民學術日愈上達，國中翕然，精研學藝，窮理、經濟、法律、醫學、兵學、物產、製造、建築、雕鏤、繪畫諸學日進，發明雷氣，製避雷柱及反射燈。……自路易十四以豪雄之資，行君主政于國中，

[45] 邱古雲述：《外國歷史講義》，頁8a-8b 。
[46] 邱古雲述：《外國歷史講義》，頁11b 。

airiti

> 諸國王侯倣之，作威削民，怠傲縱肆，下民憂鬱。時有孟的士鳩、屋爾體、盧騷等諸大儒，各著書排擊政法，主張自主之說，以抑君威，伸民權。讀其書者，無不激昂奮勵，以生一變舊政之心，法人激發暴動最甚。[47]

岡本監輔強調的同樣是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對於開啟民人，一改舊政之心的影響力。另一本同樣以《萬國史綱》爲名的著作，則是商務印書館翻譯自日本的中學教科書，可以揣想的是，當時中國對於域外知識的熱切，日本中學校的教科書亦成爲汲取世界史知識的管道。[48] 該書則有如下的敘述：「十八世紀法國哲學文學發揮懷疑的精神，鼓吹革命之氣運，其最有勢力於社會者福祿特爾 Voltaire、盧梭 Rousseau 之二大家。福祿特爾以沈痛之言，諷刺一世。盧梭立所謂天賦人權之說，倡導社會之革新，故人民益疾視政治宗教而作亂焉。」[49] 這一小節是被歸屬在法國大革命的成因當中，盧梭和伏爾泰對於懷疑精神的言論之鼓吹，是促成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之一。作者先就革命之起因進行總述，是因爲「法國人民信仰者『曰自由曰平等曰同胞』，抱持其所信仰之主義，以破國王之壓制與貴族之特權。」[50] 而革命產生之細部原因，則有路易十四（Louis-Dieudonne，1638-1715）的橫征暴斂、貴族僧侶的跋扈特權、多數人民的哀嚎反撲以及美國革命的先行典範。思想上的因素即爲前述盧梭和伏爾泰的

---

47 〔日〕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上海：申報館，1880 年），頁 16b-17a 。該書另有光緒光緒辛丑年（1901），上海書局石印本，惟書名改爲《萬國綱鑑易知錄》。

48 在該書凡例中，有如下的敘述：「本書適當於尋常中學校五年級之程度，著者以備教科書之用爲主。故頁數亦計授業之時間而定之。」美國文學博士家永豐吉、日本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譯：〈凡例〉，《萬國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 29 年〔1903〕癸卯仲夏初版），頁 1。

49 美國文學博士家永豐吉、日本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譯：《萬國史綱》，頁 219。

50 美國文學博士家永豐吉、日本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譯：《萬國史綱》，頁 218。

airiti

學說。該書尙有另一個版本名爲《再版萬國史綱》，[51] 據商務印書館書前說明，該書首刷兩千部，五月後隨即售罄再版。前後兩個版本的差別在於譯名的細微更動，再版的內容，譯名從日譯法，將法國改爲佛國。

由這幾份文本進行觀察，晚清知識人使用「革新文學」一詞來描寫歐洲的啟蒙運動實是常態。《新青年》中所使用的「革新時代」或「革新運動」，重點在於接首語的「革新」，無論是「時代」或「運動」都是用來銜接彰顯「革新」意涵的名詞。透過岡本監輔的著作，則可獲窺啟蒙哲士的思想，如何經由輿論傳播，進而引發法國大革命。《新青年》中將啟蒙哲士與法國大革命串連討論的敘事邏輯，並非《新青年》同人匠心獨運的發明，而是依循晚清以來對於這段歷史的描述。新學鉅子王韜（1828-1897）的法國史著作，或可作爲本節的結束語。王韜的《重訂法國志略》是編輯改寫當時泰西和日人關於法國史的著述而成，[52] 內中所涉及的「啟蒙運動」相關論述同樣可作爲觀察的面向。在該書卷5「路易十六新政」中有如下描述，道出啟蒙哲士的思想影響：

> 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病痘卒，其孫路易十六嗣立，自路易十四以豪熊之資，行君主之政於國中，獨持魁柄，權無旁貸，諸國王侯倣之，擅作威福。……時有孟的士求、屋爾體、盧騷等大儒各立說著書，排擊法王，主張自主之說，欲以抑君威，伸民權，讀其書者無不激昂奮勵，以生一變舊政之

---

[51] 美國文學博士家永豐吉、日本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譯述：《再版萬國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癸卯年〔1903〕五月初版；光緒癸卯十月再版）。

[52] 王韜如此自白：「余撰《法國志略》取資於日本岡千仞之《法蘭西志》、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而益以西國近事彙編，不足則復取近時之日報，並采輯泰西述撰有關於法事者，以成此書。」見王韜：〈凡例〉，《重訂法國志略》（弢園，光緒己丑年〔1889〕），頁1a 。

airiti

心，法人趁機煽誘，一唱百和，噪動尤甚。[53]

從文字上下的脈絡來看，王韜這段敘述則是改寫自岡本監輔的《萬國史綱》，在細節或相關的陳述上，並無王韜本人增添的痕跡。

五、「啟蒙運動」初登歷史舞台

1940 年，負笈德國留學的戰國策派大將陳銓（1903-1969），在一篇討論德國狂飆運動的文章中提出，在狂飆運動之前，德國文學居於法國文學之下，宮廷是以法文作爲官方語言；語言的理論與使用規則，莫不奉法國如圭臬。當時歐洲盛行的思潮是以法國爲首的「光明運動」，相信理智可以支配人生，憑藉理智運用將達致合理美好的生活。陳銓認爲對於比鄰於法國的德國而言，理智的提倡反倒像是壓抑自然情感的桎梏，唯有「狂飆運動是德國民族第一次自己認識自己的運動」。[54] 陳銓在文中拈出的「光明運動」一詞，現今在漢語世界通譯爲「啟蒙運動」。除了「光明運動」這項譯語，另曾被翻譯爲「啟明運動」。陳心純翻譯日人鶴見祐輔（1885-1973）的文稿時，就將法國啟蒙哲士伏爾泰所引領的十八世紀歐洲興起的思想文化運動，翻譯作「法蘭西啟明運動」。[55] 而留學日本的陳嫒在 1919 年的《建設》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歐洲十九世紀文學思潮一瞥〉上，則將 “Enlightenment” 翻譯成「啟蒙時代」。[56] 陳嫒的翻譯，可能來自日

---

53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頁 21b-22a 。

54 陳銓：〈狂飆時代的德國文學〉，收於溫儒敏、丁曉萍編：《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年），頁 349-352。原文刊載：《戰國策》第 13 期，1940 年 10 月 11 日。

55 〔日〕鶴見祐輔著，陳心純譯：〈法蘭西啟明運動前驅者伏爾泰——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伏爾泰的歐洲！——史家對伏爾泰的贊詞——〉，《黃鐘》第 8 卷第 7 期，1936 年。本文用的版本是「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1840-1949）」的全文掃瞄版。

56 〈歐洲十九世紀文學思潮一瞥〉，《建設》第 1 卷第 4 號，1919 年。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airiti

人的用法。由梁啟超領銜主編的《新民叢報》上，有日人八木光貫的譯文，便以「啟蒙時代」爲譯詞，這是筆者現今寓目所及，針對 “Enlightenment” 最早的譯法，該文極有可能是最早將 “Enlightenment” 拈出我們現今熟知的「啟蒙運動」意涵的譯語。日人八木光貫之文歷述國家主義教育在古希臘以迄十九世紀的發展過程，在論及十八世紀以前的教育思潮時，這篇譯文如此道出：「遂起宗教改革。人文主義勃興，稍重個人之價值，不依人種及國民之區別，而以文學之嗜好，圖組織文學上之共和團體。降及十八世紀之啟蒙時代，最重視個人之價值，個人主義達於極點。」[57] 除了「啟蒙時代」這項譯法之外，晚清以降尚有針對歐洲啟蒙運動不同的譯法流轉於世。晚清河南留日學生所創辦的《河南》雜誌，有文章論及國家之出現不在於政府之力，而在於國民之精神自覺，「古希臘之光華，伊大里之藝文振耀，北獨乙之宗教易儀，十八稘末之佛朗西革命，此皆洞性靈之奧區，極文明之骨髓者也。」[58] 法國大革命乃是開啟十九世紀歷史之先聲，「國家之興，煥乎始盛」。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在於作爲「近代文明之春雷」，社會的變動乃是起因於思想的激變，「當十八稘之后半，啟明思潮橫溢歐陸，其特色，一言蔽之曰：以理性主義與箇人自由主義二者，讎君權教權，欲盡舉舊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偉哉！新思潮之力也，奔騰澎湃洋溢全歐有大哲康德 Kant 出，是其朝宗也。康德乃十八稘思潮之代表，亦十九稘思潮之先導，謂之佛國革命精神之代表也可，謂之十九稘興國精神之先導也亦可。氏之重視理性即重視我之權能者，正佛國革命精神之表顯。」[59] 這裡的啟明思潮，便是

---

[57] 日本文學士八木光貫著，光益譯：〈國家主義教育〉，《新民叢報》第 4 年第 22 號（原第 94 號），1906 年 12 月 30 日，頁 2-3（總頁 76-77）。本文用的版本是：《新民叢報》（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6 年）。

[58] 旒其：〈興國精神之史曜〉，《河南》第 4 期，1908 年 5 月 5 日，頁 56（總頁 246）。本文用的版本是桑兵主編：《辛亥革命稀見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第 14 冊。

[59] 旒其：〈興國精神之史曜〉，頁 54-57（總頁 244-247）。

airiti

歐洲啟蒙運動的時代之風。前引羅家倫將「啟明時代」作爲十八世紀歐洲的代稱，實則有的放矢。而在談到普魯士的獨立建國歷程時，該文作者亦從思潮的演進切入，「抑十八稘末葉，啟明思潮稱霸歐陸，宗教、哲學、文藝、政治，無一不染其色采，蓋旨在理性萬能，以理解爲可以律人生一切，然其弊也乃育孽子。其個人主義之澤乃流而爲幸福主義，又流而爲知識主義，更下則流而爲斥美主義。……康德亦理性主義之人也，曷謂其救主？曰彼之說，無上命令，以理性之聲爲神之聲，要求至善，擴已而至于恆久之至道者，即其躍脫啟明主義之明驗也。由是啟明主義一轉而爲宗教爲道德爲上征其孽子，若貪生、若清談，皆夭折無遺。」[60] 這裡所用的「啟明主義」，指稱的是「啟明思潮」無限上綱之後的思想狀態。無論是羅家倫（1897-1969）使用的「啟明時代」，或是這位作者身處晚清使用的「啟明思潮」與「啟明主義」，皆可作爲 “Enlightenment” 的對譯詞，「主義」、「思潮」和「時代」，都是用來搭配「啟明」的名詞，重點在於接首語的「啟明」所代表的光明意涵。

1921 年，周太玄（1895-1968）在《少年中國・宗教問題號（下）》上，藉以討論宗教之便，分疏介紹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緣由：

> 自歐洲中古以來，久爲宗教之奴隸。……及至十七世紀之末，歐洲長夢漸漸復醒，所謂啟蒙運動者乃挾著人類眞正的感情，排山倒海而來，文學與藝術得其救助，方霍然有脫出宗教之勇氣。[61]

周太玄這裡所使用的「啟蒙運動」便是 “Enlightenment” 的對譯。羅家倫在 1920 年的《新潮》雜誌上，翻譯杜威的〈思想的派別〉，該文主要介紹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思想和實踐方法，文中提

---

60 旒其：〈興國精神之史曜〉，頁 61（總頁 251）。

61 周太玄：〈宗教與中國之將來〉，《少年中國・宗教問題號（下）》第 3 卷第 1 期，1921 年 8 月 1 日，頁 31。

airiti

及洛克的學說在十八世紀影響最鉅。文中即用中古時代與歐洲啟蒙運動相比，惟文中所用爲「啟明時代」:「十八世紀可以算是一個破壞的時代，此時的人對於一切舊思想、舊迷信都攻擊得不遺餘力，而在法國爲尤甚。當時的法國正可以算是極端奉行洛克學說的地方，不但是法國如此，在他國亦然。凡是十八世紀的歐洲人都稱中古時代爲「黑暗時代」(Dark Period)，而以自己的時代爲『啟明時代』」，且直接解釋了歐洲啟蒙運動的字源來由：

> Enlightenment，法文稱之爲 Eclairissement，德文稱之爲 Aufklärung，都是所謂「啟明」。在這個時代，不但學術思想一一革新；就是社會風俗、政治制度，經過分析方法極力破壞洗刷過一次，也就大變顏色。[62]

羅家倫明確地點出「啟蒙運動」對應的英、法、德三國的原文，惟所挑選的漢語譯文爲「啟明時代」。羅家倫在另一篇文章中爲文討論「批評」一類的文章要如何寫作，同使用「啟明時代」來表述十八世紀的歐洲，該文提及「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是一個啟明時代（Aufklarung)，中國現在還不及多多。我有一個很親敬的朋友，還想刻顆圖章，自稱『十八稘人』。我只能說現在中國有當年歐洲十八世紀的趨勢。」[63]1920 年，以張東蓀（1886-1973）爲編輯群之首的《解放與改造》上一篇討論歐陸社會主義發展史的文章，則將十八世紀歐洲世界哲學的發展，形容爲「一種通俗簡明的世界觀、人生觀，成爲歐洲全體的思潮，在歐洲哲學史上，所以就叫做『啟蒙時

---

[62] 杜威著，羅家倫、吳康譯：〈思想的派別〉，《新潮》第 2 卷第 4 號，1920 年 5 月，頁 714。本文用的版本是：《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2 年）。

[63] 羅家倫：〈批評與文學批評（通信）〉，《現代評論》第 1 卷第 19 期，1925 年 4 月 18 日，頁 17。本文用的版本是：《現代評論》（湖南：岳麓書社，1999 年）。

airiti

代』（Aufklärungs periode）」。[64]「啟蒙時代」亦有被翻譯爲「開明時代」者，如《改造》第3卷第7號上有一篇討論倭伊鏗（Rudolph Chritoph Euken，1846-1926）之哲學思想的文章，內中就提及「人類生活中向內心之活動……若宗教改革、若開明時代（或譯啟蒙）運動，若今日之社會運動皆是也。」[65] 然而，同樣在《改造》雜誌上，主題同爲倭伊鏗的學說思想介紹，「開明時代」則被轉換爲「啟蒙時代」。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是介紹希臘哲學的發展，認爲希臘哲學的論述與傳統支配歐洲人心理長達千年之久，一直到了「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才把這觀念推翻了，可以說是大大的變動」。[66]「開明」一詞亦會搭配「運動」使用，如《學衡》雜誌上，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7）論及歐亞兩洲文化之區別，《學衡》的翻譯者即使用「開明運動」介紹十八世紀的這波思潮。[67] 與前述的《改造》相同，《學衡》中介紹啟蒙運動的用法並不統一。在《學衡》的第六期中，當談起十八世紀英、法兩國思想家之特徵時，作者用了「啟蒙時代其最顯著之特徵在反抗舊說」這樣的形容。[68]

事實上，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幾種譯法外，胡適則將十八世紀的歐洲稱之爲「理智時代」。胡適在《現代評論》上撰文回憶在紐約參加一個名爲「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什麼時代？」的兩週討論會，胡適認爲「十八世紀是『理智時代』，十九世紀是『民治時代』」。[69] 在胡適

---

64 〈社會主義簡明史〉，《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號，1920年1月。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65 〈倭伊鏗精神生活哲學大概〉，《改造》第3卷第7號，1920年9月。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66 〈倭伊鏗談話記〉，《改造》第4卷第5號，1922年7月。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67 〈白璧德論歐亞兩洲文化〉，《學衡》第38期，1925年2月。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68 〈非宗教運動評議〉，《學衡》第6期，1922年6月。本文用的版本是「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的全文試用檢索版。

69 胡適：〈漫遊的感想（一）〉，《現代評論》，第6卷第141期，1927年8月20日，頁12。

airiti

筆下，十八世紀的歐洲成了「理智時代」。十八世紀啟蒙哲士訴求古代以批判當代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則是「理性」概念的重鑄，並以人之理性與宗教對抗。[70] 胡適的翻譯同樣觸及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價值。同樣在《現代評論》上的文章，顧昂若在回顧歐洲學術之進步歷程，使用的是「啟蒙時期」：

> 我以爲歐洲學術思想之得有今日，可說是二個時期的精神所促成：就是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同十八世紀的啟蒙時期。前者的精神在研究；後者的精神在革新。研究精神爲體，革新精神爲用。以研究希臘學術的結果，爲革新陳舊社會的工作：凡事以理知爲指歸，有不與理知相吻合的，即加以根本的革新。有體有用，因此歐洲思想一日千里，我國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可說是與歐洲的啟蒙時期同其效用，實不能說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同其性質。因此可說我國一部分人士已有了革新的精神，但不能說大部分人士，已做過研究的功夫。結果，我國學術思想界可說已有了新覺悟，但沒有偉大的新貢獻。[71]

顧昂若的這篇文章除了點出「啟蒙時期」這項翻譯外，亦類比了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之間的關係。由上文簡要的討論來看，無論是德文的 “Aufklärung”，亦或英文的 “Enlightenment”，作爲對譯語的「啟蒙運動」在 1920 年代的中國尚未定於一尊，仍處於眾聲喧嘩的狀態。

---

[70] Peter Gay 著，劉森堯、梁永安合譯：《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上冊）》（臺北縣：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8 年）。

[71] 顧昂若：〈給我點新鮮空氣（通信）〉，《現代評論》第 2 卷第 44 期，1925 年 10 月 10 日，頁 20。

airiti

六、結語

由上文簡要的討論可以得知，對於歐洲啟蒙運動這齣歷史事件，晚清作者似乎尚未深切意識到啟蒙運動可以作爲一個歷史時段或歷史分期，在論及這段史事時通常是輕描淡寫，或是以其他的形容一筆帶過，最具體的表述方式是以「革新文學」一言以蔽之。《新青年》同人沿襲晚清以來對於啟蒙運動的論述，仍是以「革新時代」和「革新運動」等詞彙進行敘述，作爲單數大寫的 “Enlightenment” 尚未浮現於這些作者的筆端。因此，筆者將此現象稱之爲「啟蒙運動」的「前史」（pre-history）階段。例如與《泰西新史攬要》同樣是論及歐洲十九世紀的發展史，在《歐洲十九世紀史》中，便是如此呈現「十九世紀共和政治之進步，實迫於近世文明之大勢，不可抵抗者也。……共和之運動漸啟，閥族之羈軛漸除，其最先者，則爲破除智識上之特權，所謂里涅錚士 Renaissance 學術之復興是也。此學術傳播之後，國民智識漸富，理解力亦復敏捷，遂力攻專有宗教之閥族。宗教革命，由此而起。宗教既已革命，得脫迷信之桎梏，民智愈開，更攻擊國王及貴族之壓制。至其結果，共和政治主義卒博勝利。此運動之所由始，即所謂法蘭西大革命。」[72] 作者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論及法國大革命的出現，中間便缺乏對啟蒙運動的描述。

由《新青年》實際刊登的內容來看，《新青年》開闢許多專輯，爲文介紹學人生平思想，清一色皆是以活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學者爲主題，缺乏對於歐洲十八世紀思想家的介紹，從中可看出端倪。在《新青年》討論的對象中，主要是以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爲主軸，如提倡「超人說」的尼采（Friedrich Wilheim Nietzsche，1844-1900）、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舉「個人主義」爲大纛的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提倡「互

[72] 〔美〕軒利普格質頓著，麥鼎華譯：《歐洲十九世紀史》（上海：廣智書局，清光緒28 年〔1902〕），頁2a 。

airiti

助論」的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進化論的推手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以「唯物歷史觀」蜚聲的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對中國進行未來預言的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等人爲主，十八世紀的啟蒙哲士盧梭、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人則是被放在歷史的脈絡下進行討論，[73] 相較於距離《新青年》作者群活躍時代的騷人墨士，十八世紀的啟蒙哲士則稍嫌陳舊沒那麼新穎，可能就如同陳獨秀所云：「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74] 這般的描述，無怪乎《新青年》對於歐洲啟蒙運動的關注興致缺缺了。

[73] 又或者是以隨筆方式速寫哲士身影，如陶履恭：〈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15日，頁431-432，即以短語描繪伏爾泰之機警諷語。

[74] 陳獨秀：〈通信：答愛讀《新青年》吳人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頁6。

airiti

徵引書目

《少年中國》
《申報》
《交大月刊》
《江蘇》
《改造》
《東方雜誌》
《河南》
《青年雜誌》
《建設》
《啟蒙字書》
《啟蒙算學》
《啟蒙算學除法》
《現代評論》
《游學譯編》
《童子世界》
《萃新報》
《黃鐘》
《新民叢報》
《新青年》
《新潮》
《解放與改造》
《學衡》
〔日〕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上海：申報館，1880 年。
〔美〕卡爾．休斯克著，李鋒譯：《世紀末的維也納》，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airiti

〔美〕軒利普格質頓著，麥鼎華譯：《歐洲十九世紀史》，上海：廣智書局，清光緒28年（1902）。

〔德〕彼得．蓋伊著，劉森堯、梁永安合譯：《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上冊）》，臺北縣：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8年。

王　韜：《重訂法國志略》，弢園，光緒己丑年（1889）。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編：《新時代的先聲：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圖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李翥儀、梁柏年：《西洋史》，湖北：法政編輯社，光緒31年（1905）。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著：《近代啟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啟蒙塾課初步」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2年。

邱古雲述：《外國歷史講義》，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出版年不詳。

桑兵主編：《辛亥革命稀見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高力克：〈《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42期，1997年8月。

高力克：〈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陳獨秀與杜亞泉〉，《（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113期，2009年6月。

章利新、熊琳：〈北京修繕陳獨秀舊居紀念《新青年》創刊百年〉，《國際日報》，2015年9月15日。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1040975。檢索日期：2015年12月20日。

章　清：〈「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7号，吹田：関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拠点ICIS，2011年3月。

陳　銓：〈狂飆時代的德國文學〉，收於溫儒敏、丁曉萍編：《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

黃興濤：〈晚清民初現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

踐〉，《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

嗟　予：〈新黨現形記〉，《新新小說》第 2 號，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1904 年 11 月 26 日），收於新新小說編：《新新小說》，上海：上海書店，1980 年。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

美國文學博士家永豐吉、日本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邵希雍譯：《萬國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 29 年（1903）癸卯仲夏初版。

Gimpel Denise, “Exercising women’s rights: debates on physical cultur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Kai-Wing Chow, et al. eds.,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8).

Goodman Dena,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Wagner Rudolf G.,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Milena Dole ˇz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66-122.

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1840-194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全文資料庫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現由臺灣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檢索服務。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描繪文人共和國（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http://republicofletters.stanford.edu/index.html 。）

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